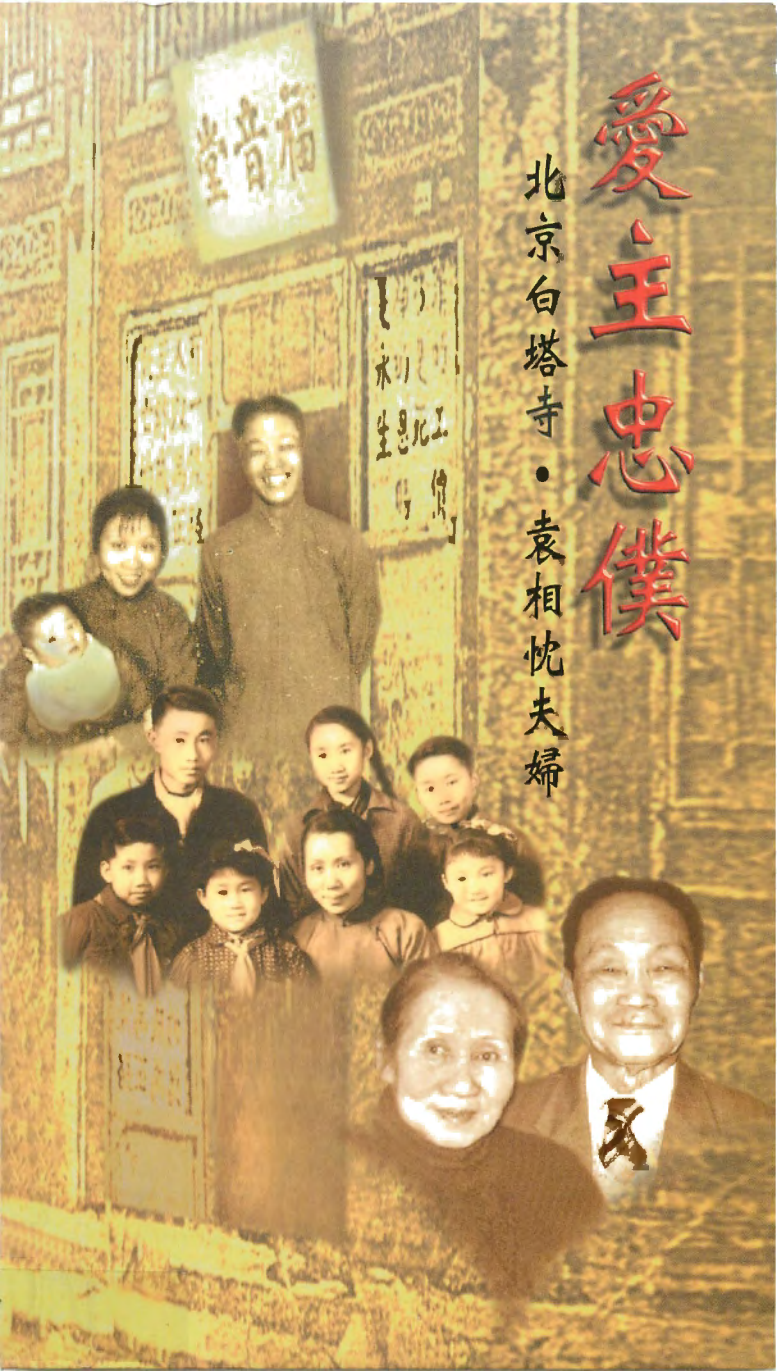


愛主忠僕

北京白塔寺·袁相忱夫婦



愛主忠僕

北京白塔寺·袁相忱夫婦

Beloved Faithful Servants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內容

Publisher's Preface	i
出版序	iii
憶述袁氏夫婦	v
1. 我的生平	1
2. 被迫遷回白塔寺的經過	50
3. 獄中意外遭橫禍	55
押入「小號」受折磨	
4. 白塔寺家庭聚會的建立	58
與被迫停止的梗概	
5. 探望離別十九年的父親	62
6. 記神僕王明道先生	67
7. 我的岳父	71
8. 在獄中所結的果子	77

Publisher's Preface

This is the very simple and unembellished account of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Mr. and Mrs. Allen Yuan. They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overcoming faith in God and their desire to live for and glorify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se brief pages will have accomplished the intended objective if you too with us are challenged and encouraged by their lives to trust in the Lord as they have in their generation.

I have known our beloved and esteemed brother and sister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cluded in their circle of closer friends. Another very dear friend, veteran missionary to China, Asta Nilsson has been requested to record her memories of the Yuan's kindness to her when a newly arrived young missionary. We thank her for a job well done.

It is a life-time rarity to be privileged to meet and know a living martyr. (James 1:12, Revelation 2:10) The Yuans **are** remarkable for, the glow of the known love of God and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n their lives is a reality! Through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lived amidst deprivation, persecution and decades of wrongful imprisonment for Christ, their unembittered lives prove them to be not only remarkable but exceptional in China today.

Their small family home near the famous Beijing White Pagoda has been a well-known depot for seeking needy souls, sorrowing

burdened saints and saddened heavy-laden servants. Many, many will echo these words with me; that to know the Yuans is to love them and to seek to know in a fuller way the God Who has so wonderfully enabled them to overcome incredible difficulties. Many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their enjoyment of the abundant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the love of the Father and the very evident fellowship and enabling of the Holy Spirit.

Well-known throughout all of China and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of the unregistered "house-churches" in Northern China, brother and sister Yuan have served as true "sheep-lovers" non-stop since his prison release in 1979.

We salute you, i.e. pay our utmost respects to you beloved brother and sister Yuan. You emerged from the furnace of affliction without even the smell of fire upon you!

We thank God for you and we all take courage that your God and our God; your Lord and our Lord is well able to save and keep to the uttermost — to His Glory.

Hallelujah! Maranatha!!

John A. Short
Hong Kong
December, 1996

出版序

本書以簡潔樸實而毫無渲染的文筆敘述了袁相忱夫婦不平凡的一生，他們在神裏面得勝的信心和為榮耀主耶穌基督而活的一生確實不可思議。

我們出版本書，目的是希望讀者和出版者藉袁氏夫婦信靠主而活的一生獲得挑戰和鼓勵。

我認識這對親愛、且備受尊重的弟兄姊妹多年，更成了他們親密的摯友。他們另一位親愛的朋友，曾多年在中國傳道的艾喜德(Asta Nilsson)，也接受了邀請，憶述她年青時怎樣得到袁氏夫婦恩慈的相待。我們感謝她所提供的資料。

遇上和認識一位活的殉道者，實在是一生的榮幸(雅一 12；啓二 10)。袁氏夫婦**確實**與衆不同，他們一生活出了神愛的榮耀和聖靈的果子！多年忠心的事奉中，他們遭遇貧困、逼迫和為基督的緣故被無理的監禁；他們默默忍受，沒有怨懟的生活，不單顯出他們與衆不同，更是在今日中國罕見的人。

他們細小的家園位於北京著名的白

塔寺附近，是那些尋找主的靈魂、負擔憂傷的聖徒和勞苦疲乏的僕人的驛站。相信很多人會與我生發共鳴，我們越認識袁氏夫婦，就越愛他們，更願親身體驗那位帶領保守他們勝過千艱萬難的 神，享受主耶穌豐盛的恩典，父 神的慈愛和聖靈活潑的相交和能力。

自從一九七九年出監以後，袁氏夫婦作了「愛羊的牧人」，服事多人，深受中國信徒愛戴，他們的住所大概是中國北方最為人認識、沒有註冊的「家庭教會」。

我們所親愛所敬重的肢體，我們要向你們致敬，從苦難煉爐中出來的你們，全沒有火燎的氣味！

我們為你們感謝 神，也因你們得著鼓舞；因你們的 神就是我們的 神，你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祂定能拯救和保守到底，榮耀歸給祂。

哈利路亞！主必快來！！

蘇約翰

香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憶述袁氏夫婦

艾喜德

(Asta Nilsson)

回想初次與袁相忱弟兄見面的情形，我只能依稀記得。一九四七年一月，我第一次踏足中國的北京，當時我腦中一片空白，惶恐萬分。那些瑞典籍傳道人可急壞了，焦慮地在機場等上好幾小時。他們接到消息，知道我乘坐的飛機機件發生了故障，被迫緊急降落，他們都十分焦急。民航局通知他們不必憂慮，可是醫生和救護車輛已經出發，開到飛機著陸的地方。由於交通運輸工具短缺，接送傳道人只能利用「臭名昭彰」的「聖保祿」古老軍用飛機。我們總算逃過大難，但所有的行李全都失掉。也許因這次遭遇，相忱弟兄特別關心我這個年輕的傳道人！

我未到北京前，相忱弟兄已從一對年長的夫婦，傅約翰和傅安娜口中認識我，他們二人本來在山西北部的荒漠工作，年初時到了北京。相忱弟兄後來告訴我，他們態度謙遜，樂意事奉，生活樸實，使他印象深刻，很受感動。我想他們定已告訴他關於我的事情。一九三七年，他們在我家中舉行聚會，領我歸主，後來我又蒙主

呼召到中國傳道。

相枕弟兄心中必是說：「她終於來了，像是從天而降。」

抵步不久，我跟隨傅氏夫婦參加一個祈禱會，在那裏我遇見四位中國傳道人和一名女傳道。其中一位是相禿弟兄，因為他懂得英語，我們很容易就彼此相熟。過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他領我到城西的小教會去。相枕弟兄和妻子、六名兒女和他的母親，一起住在教會後面的小房間。當時中國正鼓吹自強改革，反外的情緒在許多地方十分高漲，百姓渴望脫離外國的影響。像王明道，相枕弟兄認為中國基督徒應該建立起自己的教會。當時國內多數人面臨貧困，他藉著替人翻譯維持家計，和支持福音工作。弟兄講道時的情形是怎樣，我記不清楚，但他向會眾問及得救的確據時，反應總是積極的，這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會中信徒都確知自己得救。

中日大戰期間，傅氏夫婦在偏僻的山西北部度過了八年時間，他們受了很多的苦，健康欠佳。內戰似乎繼續會拖下去，於是他們決定暫時回國，打算一年後才回來。當時，我感到好像被人遺棄，信心盼望大受打擊，主卻在這時候遇上我，用祂

的恩典醫治我破碎的心靈。自此以後，相忱弟兄取代了兩位年老傳道人的位置，訓練我和幫助我成為像他們一樣。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個瑞典差會邀請我到內蒙工作，可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們被撤回北京。在那裏我有機會與相忱弟兄和另外四名中國同工再次會面交通。在十二月，瑞典差會派遣我們負責內地會在天津總部的工作，可是過了不久，我們被包圍，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由新政權統治，之後北京也遇上同一命運。時局穩定下來，火車恢復行駛後，相忱弟兄立刻前來探望，看我的情況如何。我住在天津的兩年間，他差不多每個月都來探望我，看我的中文進展情況，同時給我糾正輔導。中國正踏入新的紀元，他希望我成為「在中國人中間傳道的傳道人」，他教導我學會了許多原則，使我日後在香港的四十年事奉大得幫助。

他信心堅定，無論面對任何環境，一樣緊守神話語的真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我在一九五一年離開中國，離去前，他與朋友們送給我一幅絲綢，上面繡著十六字經文：「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是由清朝

末後皇帝的一名年老太監親手刺繡的，他服侍皇帝多年，現在信了主。今天絲綢仍然掛在我的臥室，每早晨我都看見。

我與袁弟兄夫婦離別了三十年才有機會再見。直至一九七八年，我始知道他在一九五八年被捕，妻子打聽了十五年，才知道他被囚的地方。他被監禁在黑龍江附近的一個勞改營。他的一個兒子曾長途跋涉前去探望，卻只得半小時的會面時間。我問他兒子的第一個問題是：「他的信心仍然堅定嗎？」

回答是：「當然！」雖然在守衛面前他不能多說，但他卻能說：「你們在家裏禱告，我在這裏禱告，大家在天上見面。」

聽到這事，我的內心好像起了風暴。

一九八一年一月初，我獲悉相枕弟兄已於一九七九年的聖誕出獄，透過朋友，我們最後得到聯絡。同年九月，我獲准簽證後到了北京，我手上只有一個公眾電話號碼，但我立時找到袁姊妹。我們約定第二天到我下榻的賓館見面。經過多年辛酸苦澀，現在能與他們久別重逢，內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我在門前等候，看見一對體形細小的夫婦從遠處的胡同出現，他們與我迎面跑去，直至三人擁作一團。

沒有甚麼改變！在基督裏的愛與早年的日子還是一樣，一樣的溫暖。我在北京住了八天，我們一起走到偏遠的公園，在沒有人的地方，暢談往事。當我知道這兩位弟兄姊妹所經歷的試探和試煉，使我內心感到羞慚、愧歉。妻子所受的沒有比丈夫的輕省，她肩負起供養全家的重任。十字架的凌辱活活的在我面前出現，都在他們身上可見一斑，然而那得勝的喜樂光芒卻不能掩藏。我聽不到半句埋怨的說話……只聽見感恩的說話滔滔不斷，感謝神帶領他們走過一間特別的學院。他們信心堅定，目標一致，同心盼望聽見主的稱許：「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自此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到北京，我們的友情愈來愈深，他們繼續給予我幫助，也是我失意時的安慰者。他們在主裏面的不斷勞苦，為主多結果子，我們與他們一同喜樂。沒有白費！沒有失掉……

「那些年日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珥二 25)

我為他們對主堅定不移的愛心讚美神，也為他們的悉心照顧，能在他們的翼下成長而感謝主。

生平小序

袁相忱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被假釋回到北京的，一九八零年的聖誕節，在遠方的陳兄叫我將見證寫出來榮耀神，由於終日忙忙碌碌難得抽暇，加以受假釋條件之所限，一直沒能動筆。轉瞬間十年過去了，現在自己的記憶力已大減，精力亦日益衰退，深感必須集中神給我的力量，竭盡全力抓緊完稿。但因我不善於文字且缺乏寫作才幹，為此定會有諸多敘述不清及詞不達意之處，幸好這個小冊子不是文字作品而是見證，靠著主的恩典，將主在我一生中拯救和恩惠以及主顯的大能寫出，作同道們走天路的參考。正如詩人所說：「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阿們。

（編輯按：我們依袁相忱弟兄手稿輯錄了他的見證，沒有作出加添或刪減，希望讀者從他忠心愛主、貫徹始終的一生得著勉勵和挑戰。由於袁弟兄初信時受過靈恩派的教導，故有經歷聖靈充滿和追求第二次恩典的看法。據我們與袁弟兄交通所得，並他的見證也說過，他不屬於任何宗派，也不願作靈恩派的牧師。信徒不是要經歷某種感覺或說方言，但一個人信主後不應作冷淡的基督徒。我們需要聖靈充滿，讓祂在我們裏面作工，過聖潔的生活，為主而活。）

我的身世

1914年

我原籍是廣東省東莞縣，一九一四年生於安徽省蚌埠市。有人問我，你是南方人怎麼落戶於北京了呢？在此先要提到中國科技界的先驅詹天佑先生，他從美國學成回國，後被清朝政府調到北方主持建造京張（北京至張家口）鐵路。這條以坡陡著稱、工程艱巨的鐵路，詹天佑先生根據當時的建設經費和工期的要求，採用了「之」字形線路的工程設計，並且打通了一千多米長的八達嶺隧道，解決了最困難的越嶺問題，提前建成京張鐵路，轟動了全世界。當詹天佑先生北上就任京張鐵路總工程司兼會辦（後升任總辦兼總工程司）時，帶來了一些廣東的同鄉，我先祖父就是這樣來到北方工作並在北京郊區的南口鎮安家落戶的，現在那裏仍有我的姪孫輩和自己的房產（早已被收歸房管局了）。先父原也在鐵路部門工作，因鐵路部門流動性大，故工作地點常被調動，家庭也就隨著遷移。我生在蚌埠，長在蘇北的徐州，九歲時離開除州到天津住在外祖

父家，十四歲時由於先父在北京的電影部門任職，我被接到北京繼續上小學。

下面是我的見證。

得救重生

1932年

廿年代的中國，民衆比較崇尚新式教育，先父認為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學比較好，就把我送到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學校去就讀，這是我接觸基督教的開始，也使我從小學四年級就念起了英文。但是這個所謂的教會學校，在宗教教育傳揚的僅是耶穌的博愛、人格、道德以及社會服務等，從來不講基督十字架救贖的基本要道；雖然有時也念使徒信經，卻不是從內心裏相信。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屬於現代派的，也就是不相信派，他們對聖經中的一切超然的事情都不相信，他們只有宗教的外衣，並無基督內在的生命。可是在學校的老師中有兩位真基督徒很吸引我：一位是教中文的石天民先生，他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另一位是教英語的肖安娜太太。我看到他們的人生和別的老師不一樣，別的老師下了課回到教務處就吸煙或聊天，而

他倆則是認真備課，平時待人和藹可親，處處關懷學生，臉上充滿屬天的喜樂與平安。我讀初中的時候，一直是班裏功課較為突出的好學生，這兩位老師都很愛我，當時我還沒有信神，兩位老師就常常勸我去聽王明道先生的講道。我想那時候他倆肯定會不斷的爲我禱告，否則後來我是不會信主的。

我的重生得救是有個過程的。當我十七歲讀初中二年級，已經開始懂事和思索人生哲理時，在我心中有三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一是，在自己的心裏爲甚麼有莫名的煩惱，老覺得活著沒有意思，思想悲觀想自殺？我當時的生活環境是很不錯的：自己是獨子，受父母的疼愛；家庭豐衣足食；讀書的成績也很好；還可以隨便到電影院去看電影（因先父在電影公司負責管理進口影片工作，所以我在北京各大影院看電影都不用買票）。通常在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條件下是沒有甚麼理由會促使自己思想如此悲觀的，然而想要自殺卻是事實。有一天下午，我的雙手各拿著一根大鐵釘子，要往交流電源的插座孔裏插，

想觸電而死。在我雙手伸向插座的剎那間，忽然受到自己的良心責備，想到：難道父母就這樣白白的養活我一場嗎？雖然把手縮回來了，但心中的煩惱和悲觀並沒解決，仍覺得活著沒有意思。

二是，我怎樣才能戰勝罪惡的引誘，過聖潔的生活？見到許多青年人在學校時思想很單純、正直剛毅，但一踏進社會很快就隨波逐流、腐化墮落了。我想自己將來怎麼才會不被腐蝕，像荷花那樣出於污泥而不染，做一個中流砥柱呢？

三是，人死了以後是怎樣的呢？是不是就此拉倒，一切全完或是像牛馬一樣，勞苦一生死後就與草木同朽呢？

爲了尋找最好的人生哲學和正確的世界觀，我便開始研究宗教，想看一看宗教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在卅年代初期，能影響中國社會的另有兩大宗教：佛教和儒教。按一個當年只有十七歲的孩子所能理解的，我認爲佛教雖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哲理性，但它是消極出世的，所謂一塵不染、四大皆空，這樣的人生觀不符合我的思想要求。儒教，即孔孟之道。孔子也認爲有神存在，但從來不提將來的事，

只說「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只講怎樣爲人，如忠孝節義、三綱五常、禮義廉恥等，這也解決不了我心裏存在的問題。此外，就只有基督教了。我在教會學校裏讀書，受過一些基督教育和真基督徒的影響，也聽過幾次講道，知道基督教是個出世入世的宗教，它講天國天堂、靈魂及來生之福，同時也講如何處世爲人。雖然我也認爲它在倫理方面是無比的，是個很不錯的人生哲學，但我卻不能接受基督教。因爲我認爲它是外國的道理，是個「洋教」，中國人不能信。而最根本的是，我不相信神的存在。那時我的思想很幼稚，竟說看不見摸不著就是沒有。其實，要等看見才信，那麼在世界上你能相信的東西就太少了。有許多事物雖然眼看不見也暫時不能理解，但還必須相信它的存在（因爲你的知識有限，不能立刻理解，所以我們看問題不能過於主觀和武斷，不能不虛心）。當時我甚至認爲科學一天比一天發達，人類思想一天比一天進步，再過幾十年這些老一輩的人都死了，就再不會有人相信宗教了。那時針對神是否存在這個問題，我曾跟人抬杠、辯論以及自己思

想鬥爭有半年之久。我的心靈太可憐了，知道人生需要信仰又不能相信神存在，心靈上的空虛使我生活在苦惱與黑暗之中。我堅信這時一定有人為我禱告，包括我的那兩位老師，若不然我以後是不會相信神而接受耶穌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晚上九點半，那是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的時刻。當時我已預備完來日的功課，獨自一人坐在桌前，忽然心中一動，叫我無條件相信有神，那光景是心理與生理都無法解釋的，就好像是把神放到了我心裏了，我立刻將書桌上的煤油燈捻熄，跪在地上向主承認了我的罪，求主赦免，接受十字架的救贖。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有甚麼罪？這並不是說犯了國法，那要由法律制裁。我雖沒犯國法，卻犯了天良和道德律，聖經上說「世人都犯了罪」，這樣看來沒有一個人沒有違背過良心作事，都犯了道德律。良心是個很敏感的東西，你一生做的好事記不住，但所做的虧心事，若干年後你仍會記得一清二楚。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從小孩時起所犯過的罪都承認了，如偷過我外祖母的錢，偷過鄰居家小

孩的玩具銅寶劍一把和方眼銅錢一個，還有不誠實說謊、詭詐、恨人、欺騙、思想污穢等等見不得人的行為和思想，我都一一的求主用祂的寶血給我洗淨，赦免我所犯的一切罪惡。正如聖經上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8-9)當我認完罪之後站立起來將煤油燈點亮一看，覺得整個宇宙都變了，心中滿有赦罪的平安，更知道自己的靈魂有了歸宿，因為「信子的人有永生」，從心裏能唱出「罪重擔皆脫落，我今快樂因我重擔已脫落，罪重擔皆脫落，我今快樂因我重擔已脫落」。從那天起，我的人生改變了，第二天見到同學就講述這救恩，因為在我心靈中有那麼大的改變，使我不能不講。我得救重生之後，一直是熱心追求明白真道，凡有聚會必定去參加。

聖靈充滿

1933 年

我雖然重生，耶穌成為我的救主，自己天天讀經祈禱，主日必去做禮拜，並熱

心領人歸主，但在內心卻沒有經歷得勝的生活，內心常常有交戰，如愛慕虛榮、驕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內在的不義。自己也知道這些不能討主喜悅，正如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裏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七 18-24)以上經文是形容信徒心中靈慾交戰的光景，我也有同樣的經歷，為此我需要神第二步的恩典，也就是要被聖靈充滿(弗五 18)，當聖靈降臨到人身上，不但得能力為主作見證(徒一 8)，更能靠著聖靈的大能勝過肉體，過得勝的生活，結滿了聖靈的果子(加五 22)。我們受聖靈是憑信心祈求而得，我們不必追求感覺，但我確信當萬軍之王耶和華的

靈降到一個人身上必定是有特殊表現的。我的經歷是這樣的：在我十九歲那年，山東靈恩會的人來北京，那時各大公會都不請他講道，他們只好在西城青年會崔校長家聚會，我一共去了三次，頭兩次我覺得會場太混亂，有人哭有人笑，有的大聲呼叫，有的說方言，真是亂七八糟。第三次我去晚了，他們正在禱告，我也跪下禱告，這時崔校長來到我身旁用手撫摸我的頭並說赦免他的罪吧！於是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那次是有生以來從沒哭得那麼痛快，哭完就大笑，散會後騎自行車走在大街上還在不停的笑。我信主的第二年不懂得聖經的理論，但從那天以後我靈命轉變了，我體會到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心裏了(羅五 5)，並且潔淨了我，讚美主名！信徒在靈命的追求上，聖靈的工作是極重要的。當初使徒們靠神的大能和神蹟奇事勝了迫害，將福音傳遍了羅馬帝國的版圖和歐州。在當今的教會，人的辦法太多了，限制了神的工作，聖靈沒有機會工作，那麼今天的教會該走哪條路呢？該回到神的話裏去，回到使徒行傳去，踏著使徒的腳蹤行。歷代教會的開展不是依

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聖靈方能成事(亞四 6)，要使神在使徒時代所顯的大能今天還能實現，先叫聖靈的大能打倒征服我們這個人，聖靈的大能才能不受攔阻的彰顯出來，願我們都起來追求聖靈的充滿，這是神的命令。一個重生的信徒就該問他，你受了聖靈沒有？正如保羅當初問以弗所信徒，「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徒十九 1-7)「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約七 37-39)請注意耶穌說的這句話裏「渴」、「來」、「喝」這三個動詞，你渴慕聖靈充滿嗎？來到主前喝是憑著信心接受，不要注意感覺如何。歌曰「求五旬節靈恩充滿我心，各人先將自己器皿倒空，把所有諸攔阻一概除淨，讓聖靈在我心自由動工」。

欣然蒙召

1934 年

當我讀完高中一年級之後，我即不願

再繼續念下去了，神將救人靈魂的負擔放在我的心中，世上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靈魂得救」更寶貴，更具有永恆的價值。這個負擔在我心裏催逼著我順服和放棄個人的前途及追求名利富貴的奢望，甘願去做那被一般世人所看不起的傳道人。當我把要去讀神學院，將來做專職傳道人的決心告訴父母並請他們不必再為我交納高二的學費時，不僅遭到父母的堅決反對，更使他們氣憤和大失所望。我是家中的獨子，父母盼子成龍的希望全寄託在我身上，期待我能大有作為，成名成家，光宗耀祖；他們認為做個傳道人沒有甚麼出息，對我百般勸說，用盡了軟的和硬的方法逼我回心轉意，父親甚至用哀求的口吻對我說：十誡不是叫人孝敬父母嗎？你為甚麼不聽我們的話呢？由於我決心已定，就像北京的俗話「吃了稱砣，鐵了心了」，父母也無可奈何，之後就對我相繼進行了一連串的逼迫和考驗。

我父親是個酒徒，在電影院工作，每晚電影散場後還要去喝酒，天天深夜十二點左右才回家。他向我提出，每晚他一叫門我必須馬上去開門。倘我稍有遲緩就遭

破口大罵，說養活我沒有用處，就像養活了個廢人，如同看門狗。那時我的生活處境十分艱難，在精神、肉體上均受到很大壓力。當時我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廿五至廿七節和馬太福音十章卅五至卅九節，我自己提出：我是否能愛主勝過父母？是否肯背十字架來跟從主？走這條窄路呢？這是主對你我的要求，你願否付出這個代價？

正在這個時候，北京有個遠東宣教會辦的聖書學院招收學生，條件是：清楚神的呼召，初中畢業文化，年齡廿二歲以上。但我當時只有廿歲，不夠正式生的條件，只能當走讀生旁聽了四年。那時我就認為，服侍主不在乎有沒有文憑，重要的是神的選召、聖經的知識和聖靈大能的同在，所以在旁聽學習中心裏一直很坦然。在這四年裏，我一面聽課一面藉著貧苦的環境來造就自己。學習雖不用交學費，但每學期幾元錢的講義費要憑信心仰望神來供應。那時我每天的生活是這樣的：清晨天沒亮就起床讀經祈禱，天一亮就馬上把放在庭院的煤爐點燃，爐火剛上來即將昨天的剩飯熱一熱，再將水壺壓在火爐

上，匆匆忙忙吃罷早飯，在父母尚未起床時就騎自行車去學院聽課了；中午下課回家也是吃父母吃剩的飯菜；衣服破了也沒有人管，午飯後在家整理與復習當天的課堂筆記和課程後，又準備做晚飯以及將三個煤油燈罩擦拭乾淨；晚飯後再預習一會兒課程，到八點多鐘就睡覺了，以便午夜父親叫門時立即起來去開門。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三年多，雖然較清苦，但對我的靈命長進卻大有益處，「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賽卅 20)我現在所能記得的聖經都是那時候讀的。到了第四年認識的人多了，生活也有了好轉。因為我在學習期間常常寫些稿件投到神學院辦的《暗中之光》月刊上，並且還翻譯了司可福注釋在聖經後面的關於個人佈道的論述，出版《個人佈道手冊》。一九三六年夏，神更奇妙的為我預備了路費，讓我去廈門參加宋尚節博士主領的全國第二屆查經會。

要收的莊稼多，收割的人太少，作主工有神學訓練的經歷是好，但那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聖靈大能的同在同工，請讀保羅的話(林前二 4-5)。傳道不是職業，

不是出於自我火熱要去傳道，不是由於父母將你奉獻給神而作主工，也不是看見教會的需要或受甚麼人及團體的差派。傳道人必須認定神的選召，更要準備忍受各樣的苦難，若不然定會退縮的。下面就是我蒙召侍主的經過和憑據。

忠心侍奉

1938 年

從四年神學結業至今，我沒有加入過任何宗派、任何團體，也沒有接受過任何團體的薪金。因為我相信，一個神的僕人當受神直接供給與差派，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林前九 44)。慕勒先生曾說：「不接受固定薪金，以免依靠人過於依靠神。」我的這一生侍奉都是憑信心生活的，神的應許是信實的，如果在生活的供給這件小事上不能信靠神，在別的事上神是不會使用你的，在神的府庫中沒有一個祝福不是憑信心支取的。我在神學院結業後第一個傳道的地方是天津聖會所，那是宋尚節博士在天津領奮興會後組織佈道團所建立的教會，當時聚會的負責人是周新和陳善理大夫，我在佈道所傳福音，這

個時候是一九三八年，也是這一年我與梁惠珍女士結婚的。一九三九年我回到北京遠東宣教會聖書學院，吳校長叫我在學院裏幫忙擔任翻譯，每周工作四天半，每月有數十元的收入，生活很舒適。不久我發現自己這條路走錯了，神呼召我到農村傳福音，不是在大城市過舒適的生活，中國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那裏才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可是怎樣開啓去農村傳道的門呢？神是這樣引導我的：當我還在讀神學的第二年時，美國宣聖會有位裴牧師來中國傳道，宣教師都必須先讀一年的華語，然後才能到內地去，裴牧師的心極其火熱，恨不得一時就能講華語，將福音傳給中國人。那時在遠東宣教會設有英文主日學，目的是藉著英語來吸引更多的大、中學生來聽福音，當然他們之中不少人來的主要目的是爲學英語。裴牧師也來參加這個主日學，我也去了，我去的目的是爲了做個人佈道，記下他們的住址，以便會後去拜訪他們，我就是這樣與裴牧師相識的。我們彼此是信主的人，同心同德，一見如故，交談得情投意合。他問我多大歲數、結婚沒有、能否跟他一同去農村傳

道？我說我才讀神學第二年，不能跟他去，他聽過之後有些失望，不久他就去河北省的南部成安縣了。一九四零年夏天，裴牧師因去北戴河避暑路過北京時，找到我，再次約我去農村與他同工，這正是我當時的心願，若是出於神的旨意他必預備，也賜通達的道路。因為我已覺得路走錯了，自己的抱負是農村，現在去農村的門開了，於是我就偕同內人和只有一歲多的孩子，全家三口人欣然前往成安縣，住在成安縣東關教堂裏，我內人在教堂院內教小學，我和裴牧師等人去各個村開會佈道。當時正值日本佔領時期，我們到各村佈道都要搭活動帳棚，裴牧師身穿黑色長袍、頭上頂著氣燈，另一位同工拉手風琴，我打洋鼓，每天晚飯後我們三人在村裏一走，就能招引很多人來帳棚裏聽道，並向他們分送福音單張和福音書籍。在每個村裏佈道三天或五天，所到之村都有數十人悔改信主，我們便進一步為他們講解聖經。此外，還利用農閑時間開大型聚會，培靈造就，使信徒和教會被建立。那時宣聖會的教區在山東省和河北省各有五個縣，以河北省大名府為中心設有醫院

及聖經學院，我們每年從陰曆正月初二就去各地領聚會，直到二月初才回來休息。

我從裴牧師身上學到不少功課，其中有一件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個傳道人最要緊的是要有吃苦的心志和愛人靈魂的心。裴牧師是位外國人，爲了中國人的靈魂得救，常常流著熱淚禱告。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人靈魂的心確實不如他那樣迫切，神實在紀念了他的眼淚，每次佈道之後便有多人悔改蒙恩，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我們下鄉佈道，睡的是土坑，爲此常常會招到滿身虱子，每次回到教堂住所都要用開水燙衣服滅虱子；吃的主食多爲粗糧和雜糧，副食到冬季頓頓是酸白菜，這也是當地最好的菜了。生活雖然很清苦，裴牧師卻仍勤奮侍主、誠懇愛人，獲得信徒的尊敬與愛戴，有的同工爲他起了個「火車頭」的綽號，讚譽他有巨大的帶動力。裴牧師現在已近九十高齡，身體還很好，仍經常去本國各地領會和熱忱幫助年青的宣教師。八九年夏他曾再次來華並專程前往成安縣和大名等地看望舊相識，他曾感嘆地向我表示：這是最後一次來中國

了。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那時我正在山東省朝城，我內人仍在成安縣東關教堂教小學。日美交戰後，日本人將所有在華的美國人集中到山東省滕縣，限制他們自由。這時駐札在成安城裏的日本兵和漢奸兵皇協軍趁機到處搶劫財物、強姦婦女，他們先將東關教堂包圍起來，然後闖進教堂，日本兵把住在教堂樓上的西洋人的所有東西全部搶走，用車運到城裏；其餘的漢奸兵則在樓下到處翻箱倒櫃猖狂搶劫，把我家中稍好一點的衣物都搶走了，我的壞錶放在桌子上被翻譯官看到後便隨手拿走了。日本兵還不斷叫喊著要找「花姑娘」，當年我內人才廿二歲，只得用鍋底的黑灰抹在臉上後躲藏在菜窖裏，蒙主奇妙的保守，她沒有被日本兵發現。在山東朝城駐札的日本兵僅封鎖了教堂，沒有搶教堂的東西，那天日軍通過翻譯對我們說：現在日美雙方已經交戰了，你們中國人的東西可以拿走並離開這裏。隨後我就同另一位信徒騎自行車走了兩天，回到河北成安縣，見到東關教堂也被封鎖了，有日本兵在門前把守，不准任

何人進出。我便脫下長衫、禮帽，穿上北方的粗布棉襖、戴上氈帽，找到翻譯官交涉准予辦理堂內的事務，被允許後由我召集當時住在教堂裏的男女傳道和勤雜人員向大家說明情況，並給他們每人一些錢，讓他們各自回家，最後只剩下我們一家人留守在教堂內。這時東關教堂一位叫尚青梅的老執事（他是義務傳道，有傳福音恩賜，被主重用，成安一帶許多人信主和教會被建立，多是由他服侍。可惜在後來的十年動亂時死在獄中）來到教堂對我說：你走不走，要走我給你路費！隨即拿出一些錢準備給我。因為當時他對我還不了解，以為跟外國人來的，教堂現被封鎖必定要回北京了。我回答說：我不走，我就是來農村傳福音的，現在各處的教堂都被封鎖，人都走了，中國教會怎麼辦呢！他一聽我回答得這麼堅決就馬上對我說：你不走就搬到我家裏去住吧！當天下午他就趕來一輛牛車，把我全家三口接到他家。他家住在距縣城八里的北湖村，也是我大女兒出生的地方，因此我給女兒起名為袁安湖以作紀念。從遷到尚老先生家居住以後，我與他很同心，憑信心工作和

生活，走遍了冀南五縣牧養群羊、建立教會，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前夕。既然農村工作的需要那麼大，我怎麼又會知道該回北京了呢？因為環境的開導與安排是跟主的旨意相聯的。抗戰末期八路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對傳福音開展主工有所不便。另外，我是獨子，家父早已過世，此時家母又患臟症重病，而在京年邁的外祖母更無人照顧，為此家母不斷來信叫我們回去。再者她們還沒有信主，已成為我心中的大負擔，但我始終抓住主的應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那年舊曆除夕，室外響著鞭炮聲，孩子們在坑上都睡著了，我獨自在窗前燈下心中難過，思念在京的親人。同時我又反躬自省，我在外地傳道，可是自己的母親和外祖母卻還未信主，我深感內疚並熱淚盈眶。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們全家五口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個月離開成安，途經邯鄲乘火車回到北京。那時在北京包括兩位老人已是七口人之家，手中沒有錢生活怎麼辦？當時我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離神召會很近，我常去那裏禱告，那個教會的女傳道有時也來我家作客，因

此認識了我母親，肯定她們也常為我全家的得救禱告。

神用神蹟奇事解除了我母親對基督教的「成見」。那時母親病得很厲害，因沒有錢去看醫生，只能禱告求神醫治母親的病。神蹟奇事發生了：一天傍晚，我母親躺在床上看到有一位身穿白袍的人來到她身旁，給了她一些黃色的藥物吃。過後不久，我外祖母叫我母親坐起來吃藥。母親回答說：剛吃過了。我外祖母問：誰給你吃的？我母親便將穿白袍的人給她藥吃的情況述說了一遍，當時我外祖母覺得很驚奇。從那天我母親奇妙的蒙神醫治之後，病就好了，身體日益康復，後來她在神召會受了洗。當年已七十多歲的老祖母看到這樣的神蹟，也信了主。讚美主！我們定要堅信神的應許是不會落空的，我等候了十三年，全家才得救。若是在您家中還有親人沒信主，你要相信神的應許，為他們禱告，神的心意是藉著你使你全家得救。在新約和舊約聖經裏都可見到神救我們是以家為單位的，只要你有信心的祈禱和愛心的善行，神早晚會拯救他們的。

神奇妙的帶領與安排，使我在阜城門

內大街 160 號開辦了福音堂。日本投降以後，本想繼續到外地農村去傳道，因鐵路被八路軍破壞，交通受阻而不能前往，我只好在京等待時機。當時在北京的日本人都被集中，等候集體遣返，地處東四頭條有幾座原為美國人開辦的華語學校的大樓，淪陷時被日本人佔用，在日僑被集中美國人還沒來接收之前，一位叫冉約翰的丹麥人利用此空隙以第三國籍的身份把它接管並將它改為臨時飯店，招待來京的外國人居住（冉約翰是神召會冉牧師之子，出生在中國）。那時美國軍調部的駐華總部設在協和醫院內，冉約翰被該部聘為翻譯。被日本統治了八年，中國青年學習的都是日本語，軍調部當時極需懂英語的人才，冉約翰叫我跟他一起去當翻譯，我說我的使命是為主傳福音，雖然我家有七口人，現沒有甚麼經濟收入，但我要等候神。他見我不願去軍調部工作，又對我說：你可以來幫助我在臨時飯店收款吧，每天上午收款，下午仍可以服侍主。於是我就在該飯店做了三個月的收款員工作。在飯店收款時，我認識了一位當時住在新保安來北京醫治牙齒的挪威宣教士

蘇牧師。他看到我的辦公桌上有聖經和英文刊物，他就借去看了，第二天他又來到我的辦公室用中文問我：你是傳道人嗎？我說是呀。蘇牧師很喜歡耶穌家庭出版的經文詩歌，可是他不懂簡譜，問我能不能幫他翻成五線譜，我說可以。他說：那你就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來吧，我們在一起只將廿三篇詩篇翻完就行。同時他還對我說：我有感動在北京開展工作。我說：北京已有那麼多的教會，現在和平了，我們可以出去了，這裏用不著我們。幾天後的下午，蘇牧師突然又對我說：不翻五線譜了，咱們騎車到街上看看吧！於是我們就一同外出，當我們來到阜城門內大街160號門前，見有一個三間舖面房掛著「福音堂」的牌子，我們下了自行車走到這座房子前，看到大門上貼著北京市政府的封條，從門的縫隙看到屋裏擺放著很多長椅，還有講台、風琴、黑板和唱詩架子，是個完整無缺的小會堂。經詢問看門的人，他告訴我們這個福音堂是一個日本牧師名叫織田金雄開辦的，他現在已被集中遣返，政府誤以為這房子是日本人的產業，所以貼了封條；如果你們要用，必須

去市政府辦理開封手續，再付房租錢就可以了。於是我們馬上回到飯店，蘇牧師立即駕駛吉普車帶著我來到市政府的西花廳。那位負責人一看來找他的是個藍眼珠大鼻子的外國人，還開著吉普車，就自以為來的是美國人，便很客氣的接待了我們。當他聽完我們要辦教會，現在來市政府登記，申請啓封阜內大街 160 號福音堂的談話以後，他連忙點頭從腰間掏出一張名片，邊遞給我們邊說：沒說的，有甚麼事盡管找我。同時言明以後再進行具體磋商。在我們跟他交談中，我得悉這位負責人跟我原來的老師王克忱先生住同院（基督徒的一生沒有巧合，一切都有主的安排），過了一天我到王老師家將此事告訴老師，想請老師幫助講幾句好話。萬萬沒有想到，我們既沒有費甚麼事，更沒有花錢請客送禮，只隔一個星期市政府的啓封通知就發下來了。官府辦事情少有這麼順利和爽快，這是神奇妙的開路。我拿著啓封通知找到房東，商定用每個月三百斤小米的租金將它租下便開堂佈道了。蘇牧師說：這個堂要掛神召會的牌子。我說：不！我從來不加入任何宗派。他說：若不掛神

召會的牌子就沒有薪水。我說：我一生是憑信心生活的，主必負我的責任。蘇牧師無奈，就回新保安去了。

一九四六年剛開辦阜內大街福音堂時，最初沒有信徒，我就仿效救世軍的方法，每周三次在堂前的大街上打鼓佈道，每次都能吸引不少人，如果碰上白塔寺節期，聽福音的人就更多，我一邊講一邊向聽眾分送福音單張或福音書籍。進入四七年後，從外地逃跑到北京的人陸續增多，他們流浪在外，大有聽福音的機會，比如梁德芳及其全家就是那時我打鼓打來的，梁本人信主後心裏火熱，後來做了教會的執事。另外，爲了不斷擴大影響，一方面充分利用福音堂三扇大門上的所有玻璃窗，將它貼滿福音畫和用大字書寫的經文，凡見有人在門前看，就趁機向他們作個人談道，盡量把福音傳出。另一方面，在福音堂前的屋頂上掛起八個很大、從很遠就能得見的藝術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神的話沒有徒然返回(賽五十五11)，它救了一個從東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學生之生命。那天這個青年學生很悲觀失望，本想走出阜城門投護城河自殺，當他

走到福音堂附近，忽然抬頭看到屋頂上豎著的那八個大字，他被提醒了，恍然悔悟，回到主的懷抱中，後來平安地返回東北家鄉。

一九四七年春，高愛壁夫人二次來華，在學生中開展工作，她還在北京西城青年會英文夜校設立了查經班，同時在她家也有聚會，神藉著她拯救了一些青年人，其中多人在我堂受浸。從開辦福音堂以來，我除在堂內佈道外，神還給我開了別的傳福音之門。如：解放前經常到市廣播電台用 850 和 770 千周向市民講道；在私人開辦的民聲和軍友這兩家廣播台，花錢租時間播講福音；刊印了「福音廣播通訊」，反映了廣播佈道的回聲，使抱病臥床的人聽到福音得到安慰，增強了生活的勇氣；我也翻譯了陶雷博士所著的《怎樣被聖靈充滿》；寫出了《八年回憶》見證福音堂的工作，等等。福音堂在每年夏季都要施一回浸禮，因為我們相信浸禮。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已天各一方，我深信主必保守他們直到那日。

北京解放以後，佈道的機會很少了，一般只能在堂內講道，一直到我整整侍奉

廿年時被捕入獄。在這廿年中，神給了我為祂工作的機會，我實在自覺不合用，虧欠了神的榮耀，並且沒有使祂的心滿意，但主所要的是「忠心」，我只有將這顆心獻在祭壇上求主悅納。

被捕入監

1958年

在講被捕入監之前，我得先說說「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以及我為何不參加這個運動。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後，所有在華的外國宣教士都撤退了，在全中國有那麼多的教會財產、教會醫院、教會學校等，對這麼一大攤子怎麼辦？一九五零年上海的青年會總幹事吳耀宗先生，他是位愛國人士，就聯合了劉良模、鄧欲忠等一些所謂基督教人士來到北京見了周恩來總理，他們商談了三天，最後決定中國教會應該做兩件事：一是與美帝國主義割斷關係；二是中國教會要實行自治、自傳、自養，即「三自」。吳先生回到上海印發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掀起一個「三自愛國運動」。當這個運動來到北京時，當時北京共有六十多個分屬不同宗

派的教會，凡是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都參加了這個運動。在北京公然拒絕參加這個運動的傳道人計有十一人，知名的有王明道、畢泳琴等人。我們這些人不參加這個運動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我們的教會沒有接受外國的津貼，本來就是自養的。比如，我那個福音堂是自己租的，是北京唯一租會堂傳道的；我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會堂房租是靠我做翻譯的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我沒有參加的必要。

第二，信與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轡。「三自運動」的這些發起人是屬現代派的，他們沒有甚麼信仰，吳先生是畢業於紐約聯會神學院的。

第三，政治和宗教要分開，神的東西要歸給神，該撒的東西要歸給該撒，這是兩個領域，政治不能利用教會，教會工作的開展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解放後國家設有宗教事務局，市設有宗教事務處，縣設有宗教事務各科來管理一切宗教活動；認為宗教是人民團體之一，也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們認為：教會是屬天的，是看不見的，不是地

上的組織，不是機關；教會是童女，不能與世界聯合。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國盛行的邏輯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沒有中間路線的。由於我們不參加這個運動，就被官方質問：這個運動是個愛國運動，是政府支持的，你爲甚麼不參加？不參加就是立場有問題，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王明道先生是一九五五年被捕的，我是一九五八年，我倆都被認爲是「首惡」，因此都被判處無期徒刑。當一九五九年法院宣判我爲無期徒刑時問我上訴不上訴！我想上訴也沒有用，一切由神安排吧！所以我沒上訴，當年夏天就被押解到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服刑。我被捕那年才四十四歲，有六個孩子，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才六歲，還有老母親；家裏的一切擔子全部壓在我內人的身上，我是反革命，他們便成爲反革命家屬，處處受到歧視，八口人要吃要穿，還得讓六個孩子繼續求學，把他們培養成人，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我內人忍受了許多不可言狀的痛苦與磨練，但由於神的保守，靠主勝過來了，她現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的服

侍主。她的見證另有筆述。

我被捕遭監禁，從表面上看是極大的不幸，但全能的主不會做錯事，祂所許可的都是美好的，我一點也沒有懷疑神的信實和慈愛。廿年的勞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學習與鍛煉，因萬事正在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倘若我沒被監禁，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會被批鬥整死，是神奇的保護了我；第二，我的身體絕不會被磨煉得這樣健康。在荒無人煙、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勞改犯吃的經常是高樑米和土豆；夏天穿一套單衣，冬天穿一套棉衣；每天要幹九個小時的農田體力勞動。冬季最低氣溫是攝氏零下卅多度，在零下廿多度時仍要堅持出工，人們常說的「滴水成冰」我已深有體會，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臉水，回來時盆底盆邊都有結冰。奇妙的是，在這麼多年這樣的艱苦生活中，我卻沒有生過病，僅得過一次小感冒，這就是神蹟。我被捕時身體很瘦弱，還帶著近視眼鏡，人們都背後議論說我不會活著回來了。在北大荒的勞改犯會出現下面三種結果：一種是投江或上吊自殺；另一種是神經錯亂、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種是

通過勞改磨煉，體質得到程度不同的增強。我就是屬於最後一種。我見到一些勞改犯死在那裏，也曾想過自己是無期犯而且在勞動上又很差，不能立功減刑，做一個殉道者死在東北就算了，但我定意順從主的安排，也是出於主，我每天都愉快地勞動和學習。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平安度過那漫長艱苦的歲月，而且能夠平安、健康的回來，這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蹟奇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還沒有完，還要使用我。

我在勞改的這些年裏沒有遇過基督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因拒絕參加天主教愛國會而入獄的，有兩位已死在勞改農場，另兩位被釋後還是不參加那個愛國會，他們說：我們要聽從羅馬教皇。我雖然沒有遇過基督徒，更沒有聖經閱讀，但有兩首詩歌成爲我的力量，激勵我持守到底：一首是詩篇第廿七篇，另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勞動中的休息時間，別人回到屋裏去喝水吸煙，我就站在屋外向神唱這兩首詩歌，愈唱愈有味道並重新獲得力量。特別是當我唱到「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面，那

時聽祂說：忠心僕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時，我就更甘心順服，等候聽祂說「忠心僕人」。神所要的是忠心，我願做個忠心僕人那就夠了，不看成績，要忠於主的託負。

假釋出獄

1979年

被判處無期徒刑怎麼會獲釋的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國家在政策方面有所改變，政府爲了實現統一大業，釋放了在押的一切歷史反革命犯，對我們這些所謂在解放後犯罪的現行反革命犯也頒佈了寬大規定，即：凡是已被監禁改造廿年以上且年齡超過六十歲的可以釋放，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由地方政府安置。因爲年過六十已基本失去了勞動能力，繼續勞改已經沒有實際意義，放出去還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同時，這些人經過廿多年的改造，思想上是有收穫的，社會經歷了廿多年已有了巨大的變化，將這些老反革命犯放回社會，他們已經失去了反革命的市場，對社會的危害就不大了。我和王明道先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假釋放出來

的。他是一九八零年一月回到上海，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三日回到北京家中的。被釋犯人是分批進行的，每批有數十人。七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正在吃午飯時，監獄負責人宣佈釋放人名單中有我，並讓被宣佈的吃完飯就去收拾行李，明天辦理完手續後出獄。負責人問我家住在北京甚麼地方？我說：西城區白塔寺。他將手上拿著筆放下後說：北京市戶口不能進，你有兒子沒有？我早就聽說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戶口不能遷入，我回答說：大兒子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區向陽村。那位負責人也將這個地址記到本子了，當時我心想，我離開家那年大兒子才十七歲，這些年爲了跟我劃清界限根本不通信，兒媳更是沒見過面，若將我戶口遷到他家顯然是不合適的。第二天早上發釋放證時，我一看真是奇妙極了，寫的仍是北京城裏白塔寺。這件事再次證明「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廿一 1)我當天動身，於十二月廿三日安抵家中。看到我內人肩負了廿多年全家的沉重生活擔子，靠著神的恩惠和大能沒有將她壓垮，雖已年過花甲但

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仍在堅持上班；幾年前她已代我將老母親安葬；六個孩子均被撫育成人且都成家立業，個個為人正派，其中有四個孩子被工作單位評為先進生產者，八零年兩個大男孩悔改受洗，這些都是神賜給我們家的極大恩典。後來我內人便一心在家裏服侍肢體，即使不再繼續接受退休後的返聘，每月仍有原工資百分之七十五的退休金收入，生活上沒有缺乏，經濟上就如神應許的，「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卅四 10)

我回家後要報戶口，按規定需由戶主提出書面申請，經戶主單位黨委審查簽注意見並開介紹信，再呈報到當地的公安分局去審批。我內人寫好申請書到她工作單位的政工組向負責人說：我愛人從東北回來了，報戶口需要單位黨委簽注意見和開一張介紹信，自己送到西城公安分局去審批。那位負責人說：好吧！這件事你就交給我們吧！我們幫助你去跑，你該上班就上班，別影響工作。我內人道過謝，放下申請書就走了。為甚麼他們肯這樣熱心的幫助呢？事前先有主的安排與預備。我內人是退休以後又被這個單位的負責人聘

請到他們那裏去作建築工程預算的，她工作認真負責、敬業樂業，為單位做出很大貢獻，他們一方面覺得欠我內人的情，另一方面也怕我內人因跑戶口要請假，耽擱工作會影響單位的經濟收益，所以主動表示由他們負責代辦的意見。沒曾想到的是，不到一個月，也就是在八零年一月廿三日我們就接到了公安分局批發同意落戶口的通知。我立即拿著家裏的戶口本到派出所去報戶口，值班的民警問我：你來報戶口，怎麼戶口關係沒轉過來？我拿出釋放證給他看並對他說：戶口和就業問題都由當地政府解決。那位民警轉身走到後面的屋子裏，可能是找領導請示去了，不一會兒回來後甚麼也沒說就給我辦了落戶口的手續並將糧票、油票和布票發給我了。從我的戶口能被遷回到北京以及後來自己並沒費甚麼勁且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就辦妥了報上戶口的經歷，使許多人都覺得驚奇和羨慕。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神奇的大能以及神的奇蹟，只能將榮耀歸給全能的神。阿們。

我被釋放是假釋，按國家法律的規定，獲假釋的有十年考驗期，十年滿了，

被認為合格才能有公民權；沒有公民權不能任意外出。要我在家裏呆十年熬過考驗期我不甘心，外面工作的需要那麼大，我豈能等待！因為肉體是愛工作、愛活動，「容易犯任意妄為的罪」(詩十九 13)。我回來之後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參加「三自」，靠攏積極的牧師、常向宗教事務處匯報思想，這樣會對解決我的問題有利，不用等十年就可獲得公民權。與此同時，向有關部門反映和上書申訴材料，闡明我是冤案錯案要求平反，免得背反革命的黑鍋影響我六個子女的前途；另一條是回到聖經裏去，我的主當初是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二 23)。羅馬書十二章十九節說：「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感謝主，我走了後面這條路，不說甚麼、不寫甚麼、不向人要求平反，嚴格要求自己，處處按上述的「三不」行事，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還有，保羅在書信中所用的「僕人」，原文是奴僕。僕人和奴僕有區別，奴僕是沒有自由、沒有揀選，是主人用金錢買來

用以服侍他主人一輩子的。我既然是祂的奴僕，是祂用寶血將我買贖回來的，我就不該再有選擇和自由，要甘心順服，在祂安排的計劃中在家裏侍主十年。

一九八三年政府又開始打擊「呼喊派」，當然有的不是呼喊派也被抓，監禁在獄中，神的福音也隨著在監獄中傳播起來，那些被捕入獄的信徒用他們的行為和語言影響了眾多的犯人，使一些犯人接受了福音。在山西潞城有位郭弟兄，他不是呼喊派，因他熱心傳道也被捕，同牢裏有一個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在臨刑前由郭弟兄帶他信主而得到永生。同牢裏的其他青年犯人對郭弟兄說：我們要是早認識你，信了耶穌，就不會進監獄了，我們被釋放後還要到你家裏去。全國各地類似這樣的事例很多。在我被勞改的時候，其他犯人都說我是個好人，到底為甚麼，他們沒有追問，我只引領了劉浩、趙曉岩兩名犯人清楚得救歸向主，現在我們還常通信和寄給他們聖經與福音小冊子等等。坐了多年的監牢，即使能拯救一個靈魂不死也是難能可貴的。他倆出獄後，一個住在遼寧，一個住在黑龍江，可惜他們所在的當

地都還沒有遇到信徒來幫助他們，幸好能從廣播中聽到福音受到造就。在此我請大家為在監牢中的肢體禱告，求神保守他們，仰望主，因這暫時的要成就那永遠的。

現將趙弟兄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從黑龍江給我的來信，原文抄錄如下：

忱兄如晤，主內平安：

連日來收到了您的示教、寶書、匯款單，感激的淚水奪眶而出，語言、紙筆難以表盡內心衷情，只好仰望依靠「主」而活……愧甚愧甚。蒙神恩惠，賜給精神上、生活上食糧，決心用自己的「靈」去接近神的「靈」，努力讀經逐漸接近和領會神的「靈」。

弟領會到兄嫂「蒙神保守，在動亂中十分平安，聚會照舊」，以慰愚懷。同時感激老兄對弟無微不至的關照，正如浩弟信云：「袁相忱兄是你我弟兄的大救星，我們應為他祈禱，求主賜他健康長壽，賜他永生！」道出我內心的願望。弟在這裏禱告祈求主賜予兄嫂健康長壽、幸福，賜兄嫂永生之福，賜闔家和睦快樂！

表妹之子「表姪」是工人，兼讀「電

大」，住沈陽市，我已轉告信徒的基本信仰並郵寄「益友電台」節目表，望其收聽福音廣播。

弟於十四日去清原縣郵局取出匯款，希見字勿念為盼。希兄抽暇多示教，以解茅塞，下次再談。「但願人長久，千里互慰情」，代向

令郎、令媛致意問好！

趙曉岩頓手

89年7月14日

再獻餘生

1980年

我被釋回家以後，由於精神上愉快、生活環境好，心中也滿有主恩，因此身體恢復較快，目前耳不聾、眼不花、頭髮也沒白，可是在靈性方面確實需要下功夫，很好的充實。廿多年沒讀聖經，記憶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緊讀經求得啓示和能力，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賽四十 31)。當時自己有個強烈的感覺，已近六十七歲的我還能再活幾年呢！不知那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來的日子實在近了，該怎樣儆醒等候，又該怎樣利用這短暫的

晚年餘生呢？要愛惜光陰(弗五 16)，要竭盡全力去贖回已經白白浪費掉的廿多年光陰！要在自己生命的後期單單為主而活，將來不但要去見主而還要「交賬」，我們不過是主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四 2)。我要繼續靠主忠心到底，迎著各種困難和阻力獻出我的餘生，使我將來向主交賬時無愧，歡歡喜喜的站在主的榮耀裏。

在考驗期內沒有公民權不能外出，我除了認真閱讀聖經之外，就盡量想辦法在家裏做聖工。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接待各方來訪的信徒，在家裏做培靈工作。這些年我每天都要接待許多弟兄姊妹來訪，其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遠道來的，還有不少是不認識我慕名而來的。我與來訪者親切地彼此交通、相互作見證；我內人就整天忙於倒茶做飯燒菜服侍肢體。大量的接待工作花費不少費用，但主也預備了。感謝主！在侍主方面我內人與我完全同心，她雖已年近古稀，但主賜給她力量，每天早晚辛勤操勞，卻感到無尚欣慰。從外省市來的信徒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要聖經和參考書籍；二是要尋求

侍奉之路。他們不贊成走「三自」之路，問我該怎樣帶領群羊？我回答：很簡單「回到使徒行傳去，跟著使徒的腳蹤行」，打破老框框及教會的傳統，聖經裏所沒有的一概不要，馬丁路德時代需要宗教改革，現代更需要改革，因為他們離開聖經太遠了，教會裏充滿了人的意志、人的方法，本來基督是教會的頭，現在教會另外有了頭，要經過上級的批准使教會變成政府的工具，變成人民團體之一，成為地上的機關，在組織上也效法這個世界，失去童女的聖潔且與世俗聯合。將來是無形的教會被提，所以我們建造教會一定要按著山上指示你的樣式(來八5)，在出埃及記最後兩章有十四次說「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我們不敢伸出烏撒的手去摸約櫃，聖工就是聖工，人的手不能動。烏撒的動機雖是好的，但神還是打擊他，因為不按神的話去做，神也不會賜福，外面看是轟轟烈烈，在神看來是草木禾楷，所以我們不敢再犯任意妄為的罪(詩十九13)。

在接待工作中，除國內的以外還有一些來自美國、日本、香港、新加坡、台灣

等地的信徒。其中絕大部份是以前我們之間互不相識的，他們聽說過我的事，來到中國北京要見一見這個人，聽聽我的見證，放下一些福音書籍。

二、用信件來談道傳播福音，通過文字交通解釋神的話。給我來信的弟兄姊妹較多，有時一天就能接到五、六封，郵遞員就曾對我說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總會有你三百多封來信。爲此，我和我內人幾乎每天都要擠出一定的時間寫回信或郵寄福音書籍等。

三、錄製福音錄音磁帶和放映電視錄像。由於我們當前既缺少聖經又缺少牧人，最簡便的補救辦法是充分利用錄音機的功能，在家裏錄製各種福音錄音帶，後分送給各地的肢體。幾年來已先後錄製並送出近五百盤磁帶，傳播了福音、造就了信徒。八八年從香港買回放像機和錄像帶之後更錦上添花，放映電視錄像深受廣大信徒，特別是文化水平較低的老太太歡迎，他們都認爲這是傳播福音，造就信徒的最好方法。可惜我們現有的錄像帶太少，我們需要一些講國語的帶子，請各位記念這項聖工。

四、辦家庭聚會。因為每天都有信徒來談論真理，後來就發展成固定日期，每周一次查經聚會和一次主日聚會。查經是每周查一至兩章，認真閱讀後大家發言，將所得的亮光分享。主日先擘餅，按使徒的教訓在七日的第一日，由幾位弟兄輪流主持分餅，然後大家交通共勉。由牧師主持崇拜是聖經上沒有的，信徒不是來做禮拜，不是來得甚麼，乃是要來獻上甚麼，顯出肢體的功用來。在聚會中大家都要禱告、挑選詩歌或分享讀經心得或作蒙恩見證，會上偏重聖徒的相通。聚會的性質，不是工作性的，乃是教會性的，是信徒彼此之間的。願我們的聚會體驗這恩賜，正如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廿六至卅二節和腓立比書二章一節所說的那樣。一個重生的信徒要追求第二步的恩典，那就是要被聖靈充滿，運用屬靈的恩賜來服侍教會和肢體。主日聚會去禮拜堂坐一坐聽聽講道，好像聽大報告，顯不出教會是信徒的家，活不出愛來，那不是教會生活，更談不上走教會道路了。目前我住在一間十九平方米的房子，家庭聚會後來發展到四、五十人，因為是平房，四面都有鄰居，聚會時

不敢放聲唱詩和禱告，怕干擾鄰居引起反感。也曾有人來問：禮拜堂離這兒這麼近，爲甚麼不去那兒聚會？你說你們是在讀經、禱告，別人怎麼知道你們在搞甚麼名堂！我對來問的人說：他們是主動來的，我不能說別到我家來，我可以應許以後來的人要少點（此時我還未恢復公民權）。我心想，最起碼在我屋裏應有宗教自由吧！聚會只要不妨礙生產、不妨害治安，別人就無權干涉。後來由於到我家來聚會的人越來越多，實在容納不下，只好將聚會遷到我大女兒家（他住在高樓第十層三居室），她們工廠是星期二公休，平時樓裏人很少，我們可以關上大門聚會，不會對鄰居干擾。因爲在她家裏聚會使我大女婿在道理上大有長進，他們全家四口人於八九年都受了浸。參加家庭聚會的人數像滾雪球似的不斷增多，我們就採取「化整爲零」和「打游擊」的方法，聚會的人員太多了就再分家，以家爲單位，這次在這家，下次在那家，定期輪換。當前全國聚會的形式基本上就是兩種：一種是三自公開聚會，另一種就是家庭聚會。據了解，全國家庭聚會的人數要比三自的人數

多得多。我感覺到家庭聚會更有自由、更有聖靈的同在和祝福，能活出教會該有的生活來。初期的教會是從家庭開始的，建造華麗的禮拜堂和聖品人牧師制度是從天主教學來的，並無聖經根據。

設立一個家庭聚會點要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必須全家信主；二是必須敢於聚會，有人不敢，懼怕是出於魔鬼，神所賜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只要聚會不妨礙生產，不妨害治安就大膽去做；三是環境許可，不影響鄰居的休息。另外，聚會的人數不宜過多，以卅人左右為好。人數多了會被別人看成你是人民團體之一了，若成為地上的機關，教會就變了質。

再者，我們今天不是要建造巴別塔，乃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巴別塔是要高舉發展我的團體、宣揚我的名聲，這也是宗派起源之一。據我所知，過去在北京的教會中只有兩人沒有建造巴別塔，那就是宋尚節博士和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在北京只有一個會堂，別無分號；宋尚節也沒有成立甚麼組織，哪裏請就去哪裏講道，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看見了整個的身體，教

會只有一個真理。

目前我們已有多處家庭聚會點，在京郊八里庄由一位八十歲的易老大媽主持的聚會點，她雖沒有文化，可是卻藉著禱告引領了多人信主。每星期二在她家有一次聚會，經常有十多位老太太參加，其中僅有一人識字，八八年有十五人受了洗，八九年七月又施了一次卅四人的浸禮。在西郊海淀藍靛廠村有個盲人橡膠鞋廠，廠裏有十幾位信徒，他們有瞽字聖經是從香港帶來的，每星期六有查經會，每次念一段聖經然後大家發言。他們雖然沒有肉眼，但靈眼大開，十分虔誠、熱心、愛主。

蒙神施恩，使我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結束了考驗，獲得了公民權。儘管如此，在推行聖工方面仍有諸多阻力，但有兩節經文成爲激勵我的力量，就是「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太十六 18)和「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爲王」(詩廿九 10)。歷代教會事工的發展，從來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近幾年來使我很開心的是，台灣的肢體爲大陸福音的門禱告了這麼多年，現在終於被打開了，衆多的台胞信徒

與傳道人前來探親，把福音傳給他們的親友，有的當天就悔改歸主並受了洗，這是在石家莊發生的事，他們來到北京之後就將果子交託給我看顧。有位台胞信徒說：大陸的信徒是虔誠的基督徒，因為他們都經歷過考驗。另一位台胞講得非常形像化，他說：我們在台灣正在訓練漁夫，將來要回大陸打魚。願我們為此事恒切的禱告，讓福音的門在大陸開得更大，有更多的人接受救恩，目前全國信主的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少得太可憐了！

從境外來的肢體常常問我，怎樣才能幫助中國的教會？我的回答是「祈禱」，請他們為三件事祈禱：第一，為那些將亡的靈魂禱告，因為全國信徒的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第二，為那些新悔改的肢體禱告，解放後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們須栽培，要建立起衆多在恩典中長進、在逼迫中為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們缺乏聖書，特別是工具書和培靈書籍，同時傳道人又很少，他們怎能得到牧養呢？在此我感謝神，中國信徒通過空中的廣播得造就。有的人是在無意中撥了收音機聽到福音而信了主，特別是被大眾譽為「空

中神學院」的廣播，能系統的進行聖經教訓，使國內同胞獲益非淺，許多大陸信徒為廣播事工禱告，求主賜福給為廣播工作日夜操勞的弟兄姊妹。有一位老太太，因聽廣播得益處，不僅為電台祈禱而且將她兒子給她換皮襖的錢省下寄給電台，使聞者都深受感動。第三，請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禱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箴廿一 1)神能使福音的門在中國大開，好像今日的蘇聯和東歐。在海外已有多人為此祈禱。請為這三件事禱告，神一定聽你們的祈禱，在中國拯救更多的靈魂。我們深信世界最大的復興是在中國，十二億人口這麼大的禾場正待你們來收割！

我雖已年邁，今年我是八十一歲，內人也已七十有六，但生活還都能自理，我們堅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祂來。因每個人都要見主而且要「交賬」，願您們不忘為大陸代禱一直看到大的復興在中國。阿們。

被迫遷回白塔寺的經過

一九九四年夏末秋初，我們搬到東城區朝陽門內南豆芽胡同 68 號居住，聚會仍在白塔寺的原址。當時我們考慮搬到新址去住有兩大主要好處：一、那裏是獨門獨院，既安靜又較寬敞，同時還有電話，因此無論是接待信徒和同工以及相互聯繫等等都比較方便；二、白塔寺原址專作聚會之用後，室內原陳設的床舖、書櫃、書桌等物撤除後，即可增大聚會的有效面積，雖然每次聚會我們自己要東城至西城往返奔波，稍辛苦一點，但卻可以收到聚會有效面積增大近五分之一，每次可多容納三十餘人的良好效果，得到了衆多信徒的稱讚。

在新址住了一年餘，民警曾多次來到家裏告誡要注意安全和防盜等等。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當地派出所的民警來到我家突然對我說：你們住在這裏不適宜，到你們這裏來的人那麼多，那麼複雜（可能是指國內各地和國外來的一些賓客），再有你們住在這裏並沒有辦理租賃手續，也沒報戶口，現在第四次世界

婦女大會很快就要召開了，限你們在這星期五一定要搬走，那天我要來看你們搬走了沒有。隨後，他們又問：你家裏有宗教書籍嗎？我回答說：有。幾個民警走到南屋見窗戶台上用床單罩著放有一些聖經，就說：這書是非法的，你為甚麼不上繳？然後就把放在那裏的聖經全部裝到他們開來的汽車上拉走了。當時沒有清點數量，拿走時也沒有留下任何字據。我們估計，這次被他們拿去的約有二百多本。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的三兒媳和小女兒兩人前往派出所找負責人反應：房主有許多傢俱和家用電氣、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都存放在那裏，由我們代為看管，假定我們馬上搬走後，這些東西一旦放盜丟失，我們難負賠之責，為此我們已給現住在香港的房主打了長途電話，對方表示近因身體不適，待稍好一點就馬上回北京，希望我們等他回來之後再搬，免得房子空著被壞人偷走了東西。雖經再三交涉和請求，均被警方一回拒絕，並且說：你們搬走後鎖上門，東西丟不了。當晚派出所又派幾名民警來到我家，見我們還沒有來日搬家的動靜，非常不滿意，態度十

分蠻橫和強硬，當時已經是晚九點鐘了，要我即時就去見所長。所長則叫我們立刻就搬走。我見派出所的人員態度這麼強硬，而且已經發展到根本不講道理的地步，於是我就對他們說：無論如何立刻也搬不了，明天星期五(18日)也搬不了，我家裏只有兩位七八十歲的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們放假，讓他們回來動手收拾東西搬家。可能他們聽到我說的是實際情況，就沒有再反駁我。這時有一個女民警忽然問我：你懂得甚麼叫三自嗎？我說：懂。隨後他們就甚麼也沒說，又將我家裏擺放著的許多福音單張全部都拿走了。這次拿走的東西也同樣沒有留下任何字據。另更令人憤慨的是，他們剛走不久，家裏的電話即被做了手腳，電話拿起來沒有聲音，既打不出去，又打不進來，顯然有人又利用電話來對我們施加搬家的壓力。家裏的電話壞了，沒辦法，我只好等到星期五(18日)的清晨，就急忙走到大街上找公用電話來通知我的子女和親屬，讓他們星期六早上來幫我們搬家。我們就是如此迫不得已愴促的搬回白塔寺的。星期六正當我們忙手搬家的時候，從

昨晚開始既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的電話，在沒有人向電話局查詢出現故障請求修復的情況下，忽然電話鈴響起來了（有信徒打來電話）。通常一旦出了故障反應到電話局，最快也要等好幾天才能修復。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我的住宅周圍派出所設有耳目，見我們已動手搬家就向上面做了報告，所以電話馬上就被恢復了。

感謝主，派出所民警兩次來到我家，雖然拿走了許多本聖經和福音單張，但家裏的一些更爲少的福音工具書未被他們發現拿去。還有一件要特別感謝主的是，我們已經利用了這個獨門獨院於去年和今年各進行了一次浸禮。去年受洗的有九十九人；今年道有二百二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人是從河北省唐山市專程乘火車來受洗的。另有一件使人氣憤的事：有一位老太太從湖北來到北京，爲的是受浸禮。她去三自教會的寬街教堂要求受浸，但他們不給施洗，原因是她在北京沒有戶口。原來三自教堂施洗有很多限制，如：黨員、團員、沒有本地戶口的、不是屬於北京地區的和不滿十八周歲的都不給施洗。有當地戶口的，如要受洗入教，必須

先報名，考道一年之後認為合格才能受洗。為甚麼有這麼多的限制呢？據說因有上邊的命令，理由是牧師若隨便給人施洗，他若是壞人怎麼辦？受洗的人數和姓名要向宗教事務處呈報，若是黨團員受了洗，一定要找談話的。



袁相忱弟兄夫婦 — 攝於五十年代



袁弟兄早年傳福音時拍的照片



袁弟兄在獄中時，
袁氏與兒女一起的照片



袁弟兄在獄中時，
袁氏與兒女、婆婆一起的照片



與著名的王明道夫婦合照



著名的王明道同工、他的獨子和家人



在隱蔽的地方受浸



在隱蔽的地方受浸



受浸照片



盲人工作



盲人工作 (一九八四-一九五年)



郊外旅行聚會 (一九九二年)



在朝陽門的浸池



在朝陽門屋外浸池施浸



浸禮



袁氏夫婦攝於朝陽門的家內



婚禮時袁氏夫婦受到尊敬



結婚週年紀念



家人團聚



袁氏夫婦與兒女



袁氏夫婦與兒女、女婿、媳婦



袁氏夫婦與孫兒孫女



在北京的姊妹同工



在北京的弟兄同工

獄中意外遭橫禍 押入「小號」受折磨

監獄爲了強他對在押犯的思想改造，白天要強制幹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強制政治時事學習討論。討論時人人都必須發言，不然就會捱批評受指責。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一次晚間學習討論時，我無意之中說了：「爲甚麼這幾天報紙上沒有劉小奇的消息，難道黨內也有派系之爭嗎？」這句話。沒想到我的這句話被學習組長報告到監獄隊長那裏以後，我竟遭到了飛來的橫禍和難以想像的磨難。監獄隊長橫眉豎眼的斥責我，認定我說的這句話是反動思想的大暴露，並且問我：還信不信上帝？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說：還信。爲此，便更進一步激怒了這位隊長，他認爲我：「頑固不化，反動透頂」，不是在學習會上所能解決的，必須從嚴懲處。決將我立即押入「小號」單獨禁閉，命令我每天除規定的睡覺和吃飯時外，都要盤腿坐著老老實實反省自己的「問題」。

所謂「小號」，就是監中之監，獄中之獄，是一間長寬各不足兩米，沒有窗

子，只在牢門下部接近地面之處有一個小方洞的小牢房。當我被押進「小號」單獨禁閉前，監獄隊長叫人把我衣服上所有的鈕扣都揪走了，褲腰帶也被拿去（怕在「小號」反省期間吞食扣了利用褲帶上吊自殺）。獄方經常有人從牢門的縫隙察看我是否按他的規定坐著反省，有沒有其它違紀行爲。每天兩頓飯有人從小方洞遞進食物；早晨有人從小方洞遞入濕毛巾擦一擦就算洗臉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在牢房裏的馬桶方便。再加上牢內不通風，空氣可想而知。

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小號」裏蹲了長達半年之久禁閉，半年沒見到過太陽；沒有被放過風，身體得不到活動；沒有用水洗過臉和手，更談不上洗澡沐浴；沒有換洗過身上穿的衣服，已經生滿了虱子，等等。這些非道的折磨，對我身體的摧殘是不言而喻的，我已更加瘦弱，眼睛視物模糊不清。感謝主給了我巨大的毅力，使我勝過了這次殘酷的磨難，各種邪惡都沒能動搖我對主耶穌基督的信仰。當半年以後把我從「小號」裏釋放出來的時候，我的雙腿已經不能使身體站穩，不能行走，只

能扶著牆緩緩挪動。我更要感謝主的保守和恩典，在獄中生活和營養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我的身體卻迅速的得到了恢復，這又是一樁發生在我身上的神蹟奇事。

白塔寺家庭聚會的建立 與被迫停止的梗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被假釋，自黑龍江省回到北京以後，每天都有信徒來我家尋求真理，一同祈禱和談道查經等等。爲了充實他們心靈飢渴慕義的需要，在聖靈的帶領下，我們陸續建立起查經聚會、主日敬拜聚會和青年聚會等。蒙 神的帶領和賜福，參加以上聚會的弟兄姊妹日益增多，由最初的每次幾個人，逐漸增至近百人，最多的時候竟達一百五十餘人。居室太小容不下這麼多人，許多弟兄姊妹無論是嚴冬或酷暑，寧肯站立在窄小的胡同通道上兩三個小時，堅持到聚會結束。福音事工的復興，吸引了衆多的罪人認罪悔改，蒙恩得救，歸向耶穌基督。爲此，我們每年夏季都安排一次浸禮，過去每年都有近百人或百餘人受浸，最近這兩年竟增至二百餘人，榮耀歸主名。

今年年初，國家主席簽發了加強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要實行登記的命令，隨後北京市各區即先後開展了實施登記的工作。因我住在西城區，七月卅日下午西城

區民族、宗教僑務辦公室的科長及另外兩名工作人員來到我家，向我提出登記的要求。我對他說：「按現有的條件，無論在那個方面都不夠宗教活動場所條例第二條的六項要求；我們聚會就在這間居室裏，且沒有被按立的牧師，也沒有甚麼組織和規章制度，更無經濟基金，因為不夠條件，所以我們不主張登記。」李科長提出：「到這裏聚會的人數不少，雖然你這兒不夠正規宗教活動場所的條件，但可以稱為簡單的宗教活動場所，按照規定也要登記，登記之後隸屬於某個大教堂管理與領導，只有按規定進行登記聚會才是合法的，若不登記就要停止。」於是我就對他講：「讓我考慮考慮之後再答覆你。然後他們就走了。」

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經過祈禱並且和同工認真分析了當前形勢，反覆權衡利弊，大家都感覺到這次是政府部署的全國統一行動，早在前幾個月在一些省市甚至北京郊區都發生了，對家庭聚會的領會人和參加聚會的信徒進行罰款及至被刑事拘留或入獄判刑等事件。假如我們硬是頂著既不登記又繼續堅持照常聚會，必然

會遭受到類似的後果。衆多的信徒皮肉受些苦和因罰款在經濟上受些損失（儘管大家現在的生活還不富裕）這都是小事情，更要緊的是會給神的事工帶來一些不應有損失。因爲白塔寺停止了聚會，並不等於停止了事奉和牧養工作，我們仍然可以通過探訪、個人談道、幫助信徒解決在聖經上及生活中出現的疑難。況且這裏的大聚會被停止之後，必然會推動更多的小型家庭聚會，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壯大起來，使更多的信徒能得到更多操練。基於上述原因，衆同工一致認爲：「我們寧可暫時停止白塔寺的家庭聚會也絕不進行登記。」於是八月二日我即向有關部門正式回覆了停止聚會的決定。一直在處境十分艱難中堅持近十六年的聚會，就這樣被迫停止了。

於八月二日的青年聚會，八月四日的主日敬拜擘餅聚會以及八月七日的查經聚會上，我們都分別向與會的信徒報告了要從八月八日開始，暫停這裏的各種聚會的消息和原因之後，衆多的信徒都爲失去這個蒙恩得造就的聚會而惋惜，不少弟兄姊妹甚至哀慟不已。經引導大家學習有關

經文並仔細說明情況，使大家明確了這裏的聚會雖然被迫暫停，但不等於事奉和牧養工作停止，今後大家有何聖經上的問題或有其他甚麼需要，都可以隨時來到這裏共同禱告、切磋和交通等等。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廿兩節經文使大家進一步消除了疑慮、得到了安慰，一致表示要同心合意恒切的禱告，求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做工，感動我們國家的決策人改變決定或放鬆對家庭聚會的控制；在當前大聚會暫時停止之時，要創造條件，只要環境允許就成立小型的家庭聚會，使福音事工得到更大的復興。經上記著說：「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大家堅信：黑雲之上有藍天，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阿們！

探望離別十九年的父親

我父親被捕那年是一九五八年，那時我是十一歲，還在小學讀書。當我中學畢業之後，我被分配到貴洲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在一九七七年那年工作單位給我一個任務到東北出差。我必須先回北京再往東北，東北的氣候比北京要冷得多，時常聽說那裏的天氣是滴水成冰，母親給我穿上她的小皮襖和一件舊大衣，戴上哥哥的軍帽，帶上文件整理好行裝。當時我便想起在東北監獄裏的父親，我們已十九年沒有見面了，很是想念，於是同母親商量，不如趁著出差的機會去看看爸爸。母親十分同意，馬上到商店買些罐頭點心糖果等，打好行李乘快車一天一夜，到了哈爾濱再換車到泰康，泰康是我父親被囚的地方。到了泰康還要乘汽車才能到監獄。那時正是二九天氣，哈爾濱的氣候為零下二十九度。真是冷風刺骨，呼呼的北風颳著塵土撲面，我只好頂著風前行，下午四點找到了公共汽車站，看到汽車站的發車表，一天只有一班車，每天早上六點只發一次，那只好等明天早上六點的那趟車。

在這很簡陋的汽車站上，走來走去，又冷又餓，給爸爸帶去的點心我實在不捨得吃一塊，我若是吃一塊我爸爸就要少吃一塊，還是給爸爸留著吧！我年紀輕，餓一頓也沒關係，汽車站四面通風，是敞著的不能在此逗留。我四處尋找才找到一間類似旅店的地方，是一間給拉大車的人停留休息的屋子。我走進去一看，屋內烏煙瘴氣，條件很差，十幾人一屋，就湊合住下吧！躺下休息只見白色的被子都蓋成灰色了，只有拆縐處才能見到一點白。我只好穿著衣服躺著，又怕睡過了點趕不上車，迷迷糊糊的過了一晚。早上五點到了汽車站看見一小飯館敞開的門在賣麵條，昨天因沒有車次也沒乘客，所以飯館是關著的。我吃了一碗麵，六點我便乘上公共汽車，八點鐘到了革志，那是一片荒地。經當地人指點，我到革志監獄還要有三公里路。感謝主！這一天的天氣很好，昨天還是北風呼嘯，今天卻是一點風也沒有，顯得比昨天暖和得多了。那時的心情只切望快見到父親，大步加快的向前邁進，一個小時就走到了。走的較快出了一身汗，很快就到了革志農場。先到廠部見

廠長，講明我的身份，還審查我的工作證以及出差的證明才允許我見父親。

探望的情形

約有十幾分鍾，只聽我爸爸喊一聲「報告」，隊長說進來！爸爸一進門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也不敢抬頭。隊長說，抬起頭看誰來看你。這時爸爸認不出我是誰，而且他料想不到會有人來看他。爸爸問：「你是誰？」我說我是老四福樂，他才猛然認出說：「這麼遠來看我。」爸爸很激動，走上前摸我一下，只見爸爸眼裏含著眼淚說：「你怎麼來看我！」隊長叫爸爸不要難過，說這是你兒子來看你啊，那時我看到離別十九年的爸爸顯得老得多了！但精神還是很好，隊長叫他坐在一條板凳上，我是坐在對面相距有兩米遠。隊長說：「你要向你的兒子匯報你改造的情況；爲甚麼把你關小號（獄中之獄），因爲你堅持反動立場，在外面搞破壞，在獄中仍然搞破壞，在勞動時拔草連稻子都拔下來，這不是破壞又是甚麼？今後要好好端正勞動態度，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可抗拒，否則是死路一條。」

隊長講這番話時我心裏想：我爸爸是近視眼那裏能分辨草和稻子呢？爸爸一直在看著我，只說家裏的人都好吧？我就把家中每一個人的近況一一詳細的講給爸爸聽；並對爸爸說不用惦念。媽媽她都能靠著主加的力量把家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的勞動安下心來，不用惦念我們。我也不知說甚麼，見了爸爸好像沒有話可說：楞了一會，忽然想起要給爸爸的東西，拿出罐頭糖果；隊長不准許全部留下，當時只能留下一小部分，我再三請求，這麼遠來請隊長允准多留一點吧！隊長還是不同意要我帶回去！我也沒辦法，只好裝回書包內，短短的不到四十分鐘的談話就要結束，隊長把爸爸帶走了，爸爸一直低著頭，也不敢多看我一眼，有兩個人跟著爸爸的後面走出接見的屋子。我也背上行李離開了監獄走向公路，這時已是十一點了。

神奇妙的安排

接見完畢心情平靜下來，心裏在盼著有去泰康的車沒有，便向老鄉打聽班次，老鄉說：「一般是十點路過這裏，當天好

像車還沒有過來，你就在這裏路邊等著吧。」不料十一點多，車果然來了；我趕緊的上了車。原來是司機在那邊給私人運一些貨，人家請他吃飯耽誤了時間。乘客在一直議論晚點的事。我卻爲這車晚點而感謝主！我能搭上這車，不用在多等一天而誤了我出差報到的時間。這並不是巧合，而是 神奇妙的安排。到了泰康正好趕上去齊齊哈爾的火車，連夜趕回哈爾濱，一點也沒有誤了我報到的時間。當我報到之後，安放好行李，那天中午我便即時打了一個電報，告訴媽媽我平安的探望了爸爸，詳情回家再稟告。我想媽媽見了電報，也就放下了心了。

記神僕王明道先生

一九三零年我十六歲的時候，由於聆聽王明道先生的講道而與先生相識。一九三二年我重生得救，次年由王明道先生給我施了洗禮。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我去農村傳道以前，我都是在王明道先生的會堂裏聽道和敬拜。一九四五年我從農村回到北京，第二年租了一座臨街三間門面房做佈道用的福音堂。當時王明道先生除自己開辦一座會堂之外，還編輯出版一份傳福音的季刊，福音事工已經很繁重，但在百忙之中仍堅持每月一次來我堂講道。北京解放後，一九五零年朝鮮戰爭爆發，大陸掀起「抗美援朝運動」，隨後不久，某些所謂基督的頭面人物響應政府號召，發起「三自革新」運動。那時在北京屬於不同教派的教堂有六十多間，凡是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都參加了這個運動，以表示與美帝國主義割斷關係，實行「自治、自養、自傳」。但在北京以王明道為首的有十一人堅持真道，為保持信仰純正和不受干擾，公開拒絕參加這個運動，因而引起當局和「三自」頭目的強烈不滿，在多方施

加壓力仍無效的情況下，即對這些人進行政治誣陷，並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王明道先生在一九五五年首次被捕，當年釋放後又於一九五八年再次被捕；我是在一九五八年被捕的，那時我只有四十四歲。王先生和我都被認定為是「首惡」，按「首惡必辦並處以重刑」的政策，兩人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他被押解到山西省，我被押解到黑龍江省。王明道先生是一九七九年獲釋，一九八零年一月回到上海的；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二日被假釋，廿三日回到北京的。因為我是假釋，還有十年考驗期，在考驗期內沒有公民權，也不准離開北京城。一九八九年十月，當我剛剛收到考驗期結束已獲公民權的通知，我們夫婦就馬上奔赴上海去拜見闊別卅三年的王兄嫂。那時他們夫婦的身體還好，只不過王先生的雙目已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神為他預備了一位很有愛心的張弟兄來服侍他。雖然王先生的行動很不方便，可是對來訪的中外人士都予以熱情接待。每到主日依然堅持坐在那裏傳信息，每次都有四十餘人到會聽道。因我事工在身不能在上海久留，便在王先生的

家中住了四天就匆忙起程返京。離別時都依依不捨，想不到這竟是我們與王兄嫂在地上的最後一面了。

王明道先生是中國教會中被 神所重用的僕人之一，他十分注重品德和身體力行，待人接物極其謹慎、謙卑、自律。我同他相識交往六十多年之久，從他生活中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 神給了王明道先生極大的恩賜，他在講道時口若懸河、出口成章。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王明道先生常用耶利米書一章十八節的經文自勉，不畏權貴、大聲疾呼、勇於嚴責各種離經背道的罪惡言行；對於教會中的虛偽假冒和假先知的揭露與批判更是入木三分、淋漓盡致，大有古代先知的風範。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五這卅三年期間，王明道先生的大量著作，已成為中國教會的寶貴財產；在他被捕前的兩年期間，堅守聖經真理，利用自辦的《靈食季刊》與現代派（王先生稱其為不信派）以及「三自」中的假先知展開了尖銳的大論戰，為中國教會的前途指出一條光明之路。不用說，王先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為主受了許多難以想像的磨難。在大論戰期間，王

明道先生曾經多次對我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先生的這種大無畏精神一直在激勵著我，是今天傳道人學習的好榜樣！

當我得知王明道先生被主接去時，提摩太後書四章六至八節這段經文立即湧上我的心頭。這段經文雖然是保羅臨終前的凱歌，但我認為放到王明道先生身上亦極恰當。王先生的一生可借用保羅所說的：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已經守住了，從此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保羅接著又說：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在這主必快來的前夕，我願做個愛慕祂顯現的人，那公義的冠冕也必賜給我。阿們！

我們這一生對教會的貢獻，事奉的忠誠，雖然遠不如王明道先生，但我們能做個愛慕祂顯現的人。我現在的禱告是求主在中國興起更多的王明道來，忠心並無所畏懼的投入主的事工。阿們！

我的岳父

(主恩見證)

我的岳父今年已八十二歲了，是今天中國大陸老一代的傳道人。他沒有著書立說的才華，也沒有被「三自」教堂按立的「牧師」頭銜，可是 神卻大大的使用他，重用他。他十七歲信主之後一直為主所用，被主煉成精金一般剛強。 神也從不偏待人的，真正是 神僕人的從來不靠勢力，不靠才能，全靠耶和華的靈成事。在今天悖逆的世代裏，教堂已不是 神的教會，而是被人手控制著，又加上牧師們勾心鬥角。北京三自的缸瓦市教堂中發生的悲劇事件是最好的說明。但 神今天在中國仍然留有七千人是沒有拜過巴力的，我所看見的岳父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我不會甚麼文章，靈裏也很軟弱，但通過信主以後十幾年來的學習，跟隨岳父在每日事奉主的工作上得到了各種各樣的鍛煉和主愛的激勵，我要作誠實的見證，將我所知道和親眼看見的說明，要把發生在我岳父身上主恩的見證，一個傳道人對主忠心到底的不屈不撓的工作精神，在大患

難之中仍不妥協、不拜巴力的忠心事蹟記下。雖然他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但仍不怕遭害，他與他的全家都得 神的保守。我也親眼看見了 神如何施行了奇妙的拯救……感謝主的恩典。

若問我是如何信主和接受主耶穌為救主，並如何重生得救能起來為主作點工作？當然這是主的呼召，聖靈的帶領，更準確的，是通過發生在我岳父及其家中神蹟般的事情。使我親眼看見，親身體驗了有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耶穌是我們的救主，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的。我是在一九七九年約八月份由廣州的武文珍師母帶領我信主的，當時我跪在主前認罪悔改，心中流出了感恩的熱淚。我重生得救後，為主作工得到無比的喜樂。今年我信主已經十七年了，回憶當年岳父還在獄中，我得著主所賜的膽量和勇氣，獨自派發聖經、福音書和單張，這種工作當然受撒但千方百計阻攔。約一年的時間，因我在我家中派發聖經，在山東被公安局發現了，結果我被抄家，搜查。接著我又在工作單位被拘留審查。

岳父是在一九五八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的，當時還有王明道先生等人。在當時所謂牧師階層中也出現了大分化，大批牧師爲了保全自己都妥協了，也出現猶大式的人物。這些人現今把持著今天「三自」中的要職，有些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副主席。但也有些牧師持守主的真道，如王明道及我岳父……等人，本來就沒有靠任何勢力，自己的教會早已經實行「三自」原則，並不需要再參加甚麼「三自」了。可是他們被猶大出賣，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在「不參加『三自』爲首者要重辦」的口號，岳父被判無期徒刑。初時是被關押在北京的監獄中，後來又送往東北開荒，接受勞動改造。東北的天氣寒冷，獄中的勞動嚴苛，每天十小時強制勞動，岳父的身體實在支持不下去。獄中有許多人病倒、餓死、凍死的，這些是外面人無法知道的事情。

岳父被捕入獄之後，家中留下八口子，包括一名七十多歲的老母親。當時最大的孩子才十七歲，沒有生計來源。在中國這種家庭是沒有人肯與他們冒險來往的……況且反革命份子的親屬，包括女婿

在內或子女都要遭到牽連的，在工作單位受歧視，不得重用，不能加入共產黨等。一家人的生活正面臨徬徨！在人來看一家人無法活下去，但 神並沒離棄祂的兒女。祂要動工拯救有誰能阻擋？沒有誰能，實在沒有。 神的大愛是人想像不到的：一天，突然一個陌生人來到家中說：我找袁牧師幾天了，今天才找到，你們的情況我都知道。臨走奉獻了伍拾元人民幣，說你們也不用問我的來歷、姓名，這是 神賜的。而當時正是米缸已空的時候，我看見 神奇妙的拯救，心中流出了感恩的熱淚。今天為主作這個見證，一切榮耀歸給主，讚美主恩！

岳父在一九七九年假釋回來，是想象不到的奇蹟。他沒死去，是 神要重用他。岳父坐牢長達二十一年零八個月。釋放後還被剝奪政治權利十年，先後被人捆綁長達三十一年零八個月。人生共有多少個三十年，主說真正信靠我的人在上世有苦難，但在主裏卻有平安。有一次去獄中看望岳父，大約在一九六六年。看守監獄的警察對我說：你的岳父在獄中還傳道，叫犯人信耶穌，是一個死不悔改的反革命

份子。當我見到他時，他卻那麼樣的喜樂的向我介紹了耶穌是救世主及信主的好處，使我深受教育，對基督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岳父對主的忠心不僅表現在獄中，他假釋回家以來，至今仍然堅持為主努力。他年齡已有八十二歲，岳母也已到七十七歲高齡，他們卻把自己的家全奉獻給主，每周在家中舉行三次聚會。雖然只住一間房子，聚會人數卻越來越多，平時信徒來往落繹不絕，正如一份小報說的：在北京西面白塔寺內的兩個老人家中，有基督教的「家庭聚會」，很復興，教會小能力卻很大。國內外信徒多有參加，也常常有海外朋友參觀，學習。我所看到的確實如此，神在使用二位老信徒，要把這個小小家庭教會升高，大大使用為祂作美好的見證。況且影響越來越大，成為一個走家庭教會事奉主道路的楷模。

岳父一生對主忠心持守真道，面對各種患難，逼迫，監禁甚至為主殉道從不妥協。像使徒一樣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像保羅一樣成為主的精兵，在捍衛基督信仰的真理上打那屬靈美好的仗，給後一代信徒

留下榜樣，我也要學習岳父對主的忠心，
不倔不撓，向著標杆直跑，仰望主的再
來。阿們！

張仲賢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

在獄中所結的果子

（吾友吾導師袁相忱牧師）

四十年如一日，回憶袁牧師經歷坎坷和多方災難，充分顯示出他超人的毅力和無比堅強的信念，終於戰勝了魔鬼，贏得了勝利。七九年他出獄後大力宣傳福音，對有困難的信徒，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援助。他的事蹟值得我們信徒學習，學習他忠心事主，愛人如己的博大精神。

記得那是一九六零年秋天，我在北京市南城「自新路」北京監獄和袁牧師首次見面，彼此介紹了案情。解放後人民政府對宗教界進行所謂「三自運動」，袁牧師拒絕參加，成了「現行反革命」。我是因爲一九五八年幹部下放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在學習，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大搞「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搞得農村烏煙瘴氣，農民敢怒不敢言，這種前所未有的愚蠢行動，我沉不住氣起來反對，也成爲「現行反革命」。這樣我和袁牧師是同命相憐，成了滿腔憤慨的患難之交。

北京監獄聽說是軍閥時期建造的，整

個監舍成八卦形，因此每個監舍之間都有一個三角空隙，當時叫「三角院」。每逢節日，犯人在此進行「自由活動」，搞搞甚麼衛生的，這個「三角院」就成了我和袁牧師談心的好場所。

當時我很喜歡哲學思想，對老子一書很感興趣，覺得他所談的「道」是不可思議，虛無縹渺，似有而無。我請教袁牧師，袁牧師說：這很容易，聖經上說：「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我聽後心裏豁然開朗，初步認識到 神的真實存在。從此一有機會我就請求袁牧師給我講福音。袁牧師答應我的要求，給我講解了許多 神的話。

其中最主要的有：

宇宙間只有一位偉大的活 神，那就是耶穌基督，祂是無罪的，被釘十字架，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死而復活，繼而升天。其他宗教領袖，如：佛教的釋迦牟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得，道教的太上老君，都是死後稱神，後人以偶像崇拜，都是假的。袁牧師並強調「信」字。他說：「信就是接受主，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因此有了永恆的生命，成爲 神的

兒女。」

袁牧師再三囑咐：「屬靈的呼吸就是禱告，我們並不孤單，有事靠著聖靈隨時隨地多方禱告祈求與神交通。」「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因袁牧師長時間的教導，我終於信了主，使我生活有了勇氣和力量。

當時各地「一貫道」活動很猖獗，巫婆神漢時隱時現，人民政府到處鎮壓。北京監獄管教幹部，拿來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送給袁牧師看，並說：「好好看會解決你的思想問題的。」袁牧師把小冊子看了一會，說：「我的信仰不屬於這些迷信的東西，所以我不看。」那個幹部沉思了一會兒說：「你既不屬於這些迷信範疇，那你一定是個和尚了！」袁牧師說：「是的，我可不是中國和尚，我是個洋和尚」，逗得幹部們哄堂大笑。「洋和尚」這個名號，一傳十，十傳百，不久整個北京監獄都知道了。

在北京監獄的時間，我和袁牧師不但是知心朋友，也是弟兄，他又是我的導

師，所以無話不說。北京監獄每月接見家屬時，我和袁牧師總在一起，彼此的老母親和愛人都會過面。我有一次感慨地說：「咱們在監獄『改造』，可是家裏生活怎麼辦？我有老母親、妻子和女兒。你也有老母親，還有六個孩子，怎辦？」

袁牧師說：「聽從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愛，我們相愛，不只在言語和舌頭上，也在行爲和誠實上。我愛人梁女士也信主，我相信她會妥善安排的。」

我說：「我的愛人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她不信主，將來會成問題的。」果然，二十年後，我們都相繼出監，但大家的情況就大不相同，真有天壤之別。

心裏沒有神，就沒有愛，世俗的愛，是建立在地位、金錢上，何況現在又是商品經濟，認錢不認人的時代。甚麼叫道德，甚麼叫倫理，統統拋到九霄雲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因「文化大革命」的原故，當時重刑犯都調往東北農場，不能在監獄改造。我和袁牧師被送到黑龍江省甘南縣音河農場。三月天氣，那裏還是零下三十多度，「煙煙炮炮」襲來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大家都吃不飽，每頓

飯，每人分一份兒高樑米飯（最多有四兩）和一碗菜湯，每天都過著飢寒交加的日子。我和袁牧師同睡在一個土坑上，凍得縮成一團，晚間袁牧師安慰我說：「這不算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才是苦啊！要挺得住！」袁牧師的話，使我鼓起了勇氣。

袁牧師經常把他飯菜，撥給我一些，我心裏很過意不去！袁牧師說：「吃吧，別客氣，我飯量小，我夠吃的。」其實他也不夠吃的。直到六六年底，國家又把我們重刑犯從農場，送到齊齊哈爾監獄，這兒的生活比農場好一些。

一九六七年在肇源縣革志建立新廠，我們這批「反革命犯人」從齊齊哈爾監獄分批遷到這裏。到革志不久，又分配到「新點兒」，這裏與吉林省只有一江之隔。我分配到大田組，袁牧師分配到水田組，從此我們二人談心、分享福音的機會就幾乎沒有了。

一年春季，水田組給水稻除草，工人用手拔。袁牧師認不清苗和草，把苗當作草拔掉不少；被人發現報告給幹部。幹部們說：他是破壞生產。於是召開了批鬥大

會，批鬥袁牧師。他被推到批鬥台上，犯人們大聲呼叫口號，震耳欲聾。有的犯人走到台上推推拉拉，還沒打人。我和隊長說：「我們北京城裏人都不認識莊稼，我會把麥苗兒當蘿菜。」幹部說我爲他辨護，同情他，叫我「反省」。

當時袁牧師在批鬥台上，態度自然，並不緊張，大有旁若無人的樣子。事後，我們問他當時的想法。

袁牧師說：「我根本沒把這伙人放在眼裏，只當他們是一群『瘋子』，讓他們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剛強人，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

一九七九年袁牧師出監，回到北京。我也在八一年出了監，因家庭問題沒能回北京，暫留東北。袁牧師老夫妻倆，爲我的家庭問題，操了很多心，作了很多。所作的一切，我只有從內心感謝。袁牧師知道我一個人生活在東北生活困難，不斷給我寄錢，又不斷給我寄來聖書，直到現在，已有十七年之久了。

我從內心感謝主和袁牧師對我的恩寵、援助。

我效法袁牧師，為主多工作，廣傳福音。我在東北也發展了聚會，有十多位信徒，有的信徒還看見主所行的神蹟。

一九九四年二月袁牧師給我來信，有一段話，使我銘記不忘。他說：

「罪的種子早已存心內，人之初性本惡。我已有救世主，因我信了耶穌，使我人生觀有了轉變，活得更有意義，來世有了永生之福。在廿年又八個月的改造中，我一次也沒有病過，心情是舒暢的，因我心中有盼望，有了生活的力量及勇氣，有了不同的世界觀，不論甚麼處境，都能處之泰然。這是世人所沒有的，也是他們不能理解的。」

我兩次從東北到北京去看望他，第一次是在九一年三月，第二次就是今年四月初。

我看到袁牧師年逾八旬，體魄康健，精神飽滿，滿頭烏髮，談笑風生，大有青松翠柏之象。

這不是 神的福報，又是甚麼？使我從內心深處感到高興和羨慕！

袁牧師是我今生今世的恩人、摯友和導師。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奈何，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記憶力也大大減退，有些事兒想不起來了，暫寫到此。

劉浩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愛主忠僕》以簡潔樸實而毫無渲染的文筆敘述了袁相忱夫婦不平凡的一生，他們在 神裏面得勝的信心和為榮耀主耶穌基督而活的一生確實不可思議。

他們一生活出了 神愛的榮耀和聖靈的果子！多年忠心的事奉中，他們遭遇貧困、逼迫和為基督的緣故被無理的監禁；他們沒有怨懟的生活，不單顯出他們與眾不同，更是在今日中國罕見的人。

自從一九七九年出監以後，他們作了「愛羊的牧人」，服事多人，深受中國信徒愛戴，他們的住所大概是中國北方最為人認識、沒有註冊的「家庭教會」。

袁氏夫婦如同從苦難煉爐中出來，全沒有火燎的氣味！

先鋒出版社
Stephanus Publications